

毛泽东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理论是对马列毛主义的重要贡献

Edith B

为避免单方面意识形态灌输，我们在此推荐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先生在其著作中发挥了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望各位读者多方面综合参考、独立思考。

——布尔什维克

ONCE AGAIN, YAN'AN

MAO ZEDONG'S THESIS THAT «THE
BOURGEOISIE IS RIGHT IN THE
COMMUNIST PARTY»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
MAOISM

By Edith B.

“我不会承认任何罪行，不是因为我想与人民断决，而是因为我是清白的。如果我必须承认什么，我只能说我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失败了。”

江青：《审判宣言》（1981）

近期，一些迄今尚未公开的中共内部文件的出版，使人们对毛泽东同志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终贡献——尤其是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理解。^[1]

在 1976 年初，毛泽东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2]

尽管这个理论之前是已知的，但包含它的整个文件却并不为人所知。此外，许多中文出版并推行的相关文件并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们从未被从中文翻译过来，并在 1976 年 10 月的国家政变后被走资派镇压取缔。

随着这些文件的发布，有必要重拾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研究。这些文件揭示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列毛主义的最后贡献。掌握了这个理论，就有可能了解整个 20 世纪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



1967 年 1 月的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成就。

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毛泽东发挥他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3]

该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创性的和质的新发展。本质上，毛泽东是在说，在资产阶级大体被击败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他没有说走资派——即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出现在党和国家内部——他只是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要怎么理解？作为客观的经济事实这与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息息相关。在研究它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之前，让我们先研究一下该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卡尔·马克思在1852年指出：

“……无产阶级越来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是不断革命的宣言，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通向普遍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它们赖以生存的全部生产关系、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对应的全部社会关系，为的是这些社会关系派生的全部思想的革命化。”^[4]

这一重要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这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什么是共产主义？它是一个永久的（即

不间断的)革命,直至达到一个没有私人财产、国家和父权制的社会。要达到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废除全部阶级差别,废除它们所依赖的全部生产关系,废除全部与这些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以及全部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观念。这“四个全部”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原则,这意味着实际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

在马克思对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论战中,他在长篇大论中指出了如何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基于上述的“四个全部”的变形的逐渐的过程。马克思写道:

“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正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无论在经济上、道德上还是思想上,它在各个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胎记。相应地,个体生产者(在必要的扣除之后)从社会得到的回报,正是他们给予社会的东西。他们给予的是他们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工作日由个人日工作时间的总和构成;个体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是由他们所贡献的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份额。他们从社会获得证明,证明他们提供了某某数量的劳动力(在扣除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共同基金之后);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从消费资料的社会存量中取得与同等数量劳动力成本一样多的东西。他们以一种形式提供给社会的同等数量的劳动,又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回报。

这里显然与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相同,因为是等价交换。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除了他们的劳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给予,又因为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移给个人所有。但就后者在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与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相同: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与另一形式的等量劳动交换。

因此，这里的平等权利仍是按资产阶级法权原则，虽然原则和实践不再对立，而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交换只是普遍存在，而不是个别地存在。

尽管取得了这种进步，但这种平等的权利仍不断受到资产阶级残余的污名化。生产者的权利与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平等在于是以平等的标准为尺度，即劳动。

但一个人在身体或精神上优于另一个人，相同的时间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可以劳动更长的时间；而劳动，作为衡量的尺度，必须由它的持续时间或强度来定义，否则它就不再是衡量的标准。这平等的权利是不平等劳动的不平等权利。它不承认阶级差异，因为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工人；但它默认不平等的个人禀赋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平等的生产能力是一种天然的特权。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就像任何权利一样。就其本质而言，只适用于平等的标准；但是不平等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不平等的，他们就不会是不同的个体）只能用一个平等的标准来衡量，在此他们被置于一个平等的观点之下，只从一个确定的方面来看——例如，在目前情况下，仅被视为工人，从他们身上看不见其他东西，其他一切都被忽略了。进一步讲，一位工人已婚，另一位未婚；一个人的孩子比另一个人多，以此类推。因此，在劳动能力平等的情况下，社会消费基金也平等，但一个人会在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得到更多，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更富有等等。为了避免所有这些缺陷，权利必须是不平等的，而不是平等的。

但这些缺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阵痛之后刚刚诞生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前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及以其为条件的文化发展状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个人从属于劳动分工的奴役地位及因其产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現象已经消失了。在劳动不仅成为一种生存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

需要之后；在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所有合作财富的泉源都更加充沛地流淌之后，只有那时，才能全面跨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视野，让社会在它的旗帜上镌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5]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仍有上述“四个全部”的残余。其结果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存在，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被淘汰。因此，国家（state）也继续存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由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建立在维护这种真正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的国家！列宁指出：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作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并未完全废除，而只是部分废除，仅在迄今实现的经济革命部分，即仅在生产资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承认它们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将它们转化为共同财产。在那个范围内——也只是在那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消失了。

但是，就其它部分而言，它仍然存在；它在产品分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劳动力分配中仍占据调节者（决定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经实现；另一个社会主义原则：‘等量劳动换等量产品’也已经实现。但这还不是共产主义，它还没有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它给予不平等的个人以不平等的（真正的不平等）劳动量、等量的产品。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陷’，但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沉迷于乌托邦，我们就不能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后，人们能立即学会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为社会工作。此外，废除资本主义并没有立即为这种变化创造经济前提。

此时，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再没有别的规则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仍需要一个国家，它在保障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的同时，保障劳动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只要不再有任何资本家、任何阶级，以及不再有阶级被镇压，国家就会消亡。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仍保留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维护，它使实际的不平等神圣化。想要国家彻底消亡，就需要彻底的共产主义。

.....

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领会恩格斯无情地嘲弄使‘自由’和‘国家’这两个词结合起来的荒谬言论的正确性。只要国家存在就没有自由。有自由就没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在这种状态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了，因此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根源之一也消失了——此外，所谓根源，仅仅通过将生产资料转变为公有财产、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即消除的。

.....

在它的第一时期，或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成熟，也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残余。因此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其第一阶段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有趣现象。当然，有关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能够强制执行法律规则的机构，法权就什么都不是。

由此可见，在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没有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内也不仅保有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有资产阶级国家！”^[6]

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必定存在，在“四个全部”逐渐废除并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定存在一个国家——列宁称之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为了在恰当的语境中把握这个理论，我们必须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社会在两条道路上斗争——马克思称之为“不断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只是向消灭一切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在这个过渡时期，正如毛泽东正确指出的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受到限制。”^[8]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政权内部产生和持续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那么它的经济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剥削。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工人的工资是根据他们的贡献，再“扣除他们为共同基金所付出的劳动”，即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从劳动过程中提取一定数量的剩余价值之后。马克思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强调了巴黎公社缩减这部分“共同基金”的决定，并延伸至把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限制）。马克思写道：

“警察不再继续充当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是立即被剥夺了政治属性，变成了负责的、随时可以撤销的公社的代理人。行政部门的其他所有官员也是如此。从公社成员往下，公共服务的酬劳数额必须与工人工资的数额同等。国家高官的既得利益和特殊津贴随着高官本身的消失而消失。公共职能不再作为

工具为政府私有。不仅市政当局，而且迄今为止由国家行使的全部职权都将交到公社手中。”^[9]

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时就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

“列宁说过：‘小生产不断地、每天、每小时、自发地、大规模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也发生在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党员中。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10]

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来自马克思所说的“共同基金”。这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些工资不是对生产性劳动所产生价值的回报——回报来源于产生的价值——而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这是一种小生产形式，正如列宁所说，“产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1]因此，不仅在整个社会，而且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不断产生出来。

这显然构成了一种剥削形式。客观地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机构的有偿工作人员——作为经济范畴——构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精髓所在。该理论指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资本家。毛在上面的引文中还指出：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为什么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呢？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写道：

“此外，我认为我们还必须放弃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采取的某些其它概念——马克思关注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人为地应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关系。我指的是诸如‘必要’和‘剩余’劳动、‘必要’和‘剩余’产品、‘必要’和‘剩余’时间这样的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阐明剥削工人阶级的根源——剩余价值——并武装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智力武器。马克思使用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关系的概念（范畴）是很自然的。但至少可以说，现在使用这些概念是很奇怪的，因为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失去权力和生产资料，相反，拥有权力并控制生产资料。现在，在我们的制度下，说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或者‘雇佣’工人听起来是相当荒谬的：好像拥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雇佣自己，把劳动力卖给自己。现在谈论‘必要’和‘剩余’劳动同样奇怪：好像在我们的条件下，工人为扩大生产、促进教育和公共卫生、组织国防等等贡献的劳动，对于现在掌权的工人阶级不是必须的，不是为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所必须的。

应当指出，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他研究的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其中，马克思承认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是为了扩大生产、教育及公共卫生、行政开支、建立储备等等，与为满足工人阶级的消费需求所花费的劳动力一样必要。”^[12]

这仅在一方面是正确的。正如列宁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的那样，“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作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并未完全废除，而只是部分废除，仅在迄今实现的经济革命部分，即仅在生产资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承认它们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将它们转化为共同财产。在那个范围内——也只是在那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消失了。”因此，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

工人身上提取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服务等形式返还给他们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在支付非生产性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报酬方面，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这仍然是一种剥削。而且，它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总而言之，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从工人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在客观上是所有这些人所属的经济范畴，也包括左派成员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这样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正如毛正确指出的，只有走资派才是。对于左派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和恩格斯类似的情况，他是旧资产阶级的成员，但终生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因此，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党内资产阶级”一词只用来指走资派，而不指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是有道理的——但作为一个经济术语，把所有人员都归为资本家是必要的。为的是把握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这个理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有争议，但我不这么认为。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贵族作了同样的观察。他指出，政党、工会和其它工人阶级组织的工作人员被资产阶级以百万种不同的方式收买。这构成了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社会爱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发生在共产党内部：职业革命者的报酬是由党费及党以其它形式获得的利润支付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防止机会主义在这样一个党内出现的第一步——忽视它必然导致机会主义的胜利。

最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仅是党和国家机器内部的小生产，还有一般的小生产。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也在党和国家机器之外不断出现。这些新的资本主义成分代表的是非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党内资产阶级则代表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由此可见在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几十年里，社会-法西斯和资产阶级

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哪种资本主义的“影响”将在那里建立。在苏联，非国家垄断资产阶级赢了，但在中国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当然，这两个派别相互勾结，相互争斗，必须强调的是，它们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是相互帮助的。例如，刘少奇推动了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13]

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新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政治为中心。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只能通过与“四个全部”的长期斗争来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是要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上。

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必须以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中心

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对它的限制，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巩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的本质。毛泽东指出：

“我国目前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的，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受到限制。所以要是林彪这样的人上台了，推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容易的。因此，我们应该多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14]

毛泽东在这段引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只能通过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逐渐巩固，而资本主义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恢复。事实上，这“是很容易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资本

主义确实在 1976 年夏秋短短几个月就复辟了。1976 年 10 月的国家政变只是这个过程的高潮。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指出：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15]

我的见解与某些人是冲突的，如（Deng-yuan Hsu）、金宝瑜等，他们不明白党内资产阶级问题。例如，他们说“1949 年到 1978 年的过渡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自 1979 年的改革逆转了过渡的方向”。^[16]因此在他们看来，直到 1978 年华国锋下台，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在走。这与毛泽东的理论背道而驰，因为重点在于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生产关系。正如毛泽东在 1969 年指出的那样：

“显然，我们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的基础并不牢固。据我的观察，恐怕在相当大部分的工厂——我不是指全部或绝大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中。并不是说工厂的干部里没有好人。曾经有。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和支部书记里曾经有好人。但他们走的是刘少奇的路线，只靠物质激励，以利益为主导而不是推无产阶级政策，发红包等等……但工厂里确实有坏人……这表明革命仍未完成。” ^[17]

这指引我们不再关注所有制，而是关注领导权问题——哪个阶级在领导所有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受到限制还是扩大了？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斗争的本质。这与上面两位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无关。张春桥指出：

“毛主席的讲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在所有制问题上，和其它一切问题一样，我们不仅要注意形式，还要注意它的实质内容。人们充分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重视所有制问题是仅在形式上解决还是在实质上解决，

不重视对所有制有反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另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形式——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两个方面和上层建筑在给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以及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决定了哪个阶级事实上拥有这些工厂。同志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把官僚资本或国家资本所有的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的。我们不是派军管代表或者国家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改造吗？历史上所有制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都先于夺取政权，然后再利用政权来实现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巩固和发展新的制度。不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自然产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如此。官僚资本控制着旧中国 80% 的工业，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之后，才能改造并为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复辟必然先于夺取领导权和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就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改变苏联所有制的方式吗？这不就是刘少奇和林彪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些工厂和其它企业性质的方式吗？”^[18]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走社会主义，必须围绕上层建筑问题。就是说，必须看指导党和国家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华国锋的路线是扩大而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华国锋提出了“原地踏步”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在谈到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时，华国锋说：

“在全国建设大寨县，就是让中国每个县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全力建设社会主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19]

在这里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安定团结”。但对这个修正主义人物来说，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意味着什么呢？他进一步表示：

“这意味着各县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食为纲，全面发展’使粮食、棉花、油料、生猪、各种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的产量超过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和国家计划的指标。我们要使农业现代化更加有力地推动和保障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大大增强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备战抗灾的物质基础。”^[20]

学大寨的问题，根本上是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江青在华国峰发言的同一场会议上的立场与他的路线完全冲突。她说：

“现在全国农业生产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可以归咎于自然灾害和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自然灾害是可以克服的。国内不是出现了很多红旗渠吗？这就是我们的同志们战胜旱灾的最好证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复辟是很危险的，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有害影响**已经彻底消除（编者注：即表面的、明显的影响）。有报告说在部分生产还存在着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政策。（扩大自用地块，扩大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实行分户定产）。是不是很奇怪？根据我们江西同志的报告，该省的一些县对中央的农业政策认识不够。他们疑虑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里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可行性。这种保守态度的出现也是农业发展的绊脚石。同样，有些同志在对中央的报告中质疑靠农业银行发展农业经济的可行性。在此奉劝大家，一切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都要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而不是依靠农业信贷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争取更大的成就，这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自力更生，我们才能战胜困难。”^[21]

毛泽东指出，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式发展，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纲。他说：

“如果社会主义不占领农村战线，资本主义肯定会。是否有可能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道路？”^[22]

华国锋提出的路线，正是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所说的“原地踏步”——忽视阶级斗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毛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一切都是目。

.....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

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23]

《Rethinking Socialism》一书的作者（编者注：金宝瑜女士）围绕所有制问题，而不是哪个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问题，最终站到了支持华国锋修正主义的立场上。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从何而来？它与华国锋一起上台。Hsu 和金到底反思的是马列毛主义原理。其他不理解毛泽东最终理论的人也是如此。

在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走资派取得政权后复辟的，而不是在旧的所有制复辟后。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发生在1976年，并以10月的政变告终。早在1973年8月的第十次党代会就是它的预演，周恩来领导了一批走资派重新掌权。最迟在1976年6月，毛泽东就指出，走资派已经夺取了政权。在写给江青的《遗嘱》中（编者注：该诗真实性未核实，但引段有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评论提供理论支持），他写道：

“不妥协是好的。

如果刀刃转向，我相信它已经转了，来反对革命，

那就要再次发动游击战。

再一次，延安……”^[24]

这里所说的“妥协”，是指与走资派及其同盟者中间派妥协。此前，毛泽东曾在1975年5月批评江青和张春桥孤立自己，不争取中央多数，而是作为“四人帮”。^[25]这种宗派主义做法导致右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获胜，此时“刀刃（转向）反对革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立即“再次发动游击战”稍后我将回到这个关键点。现在，我只想说，这清楚地证明了我的观点，即走资派已经在1976年5月掌权，他们只需逮捕左派领导人来“正式化”他们的权力攫取。

现在要着手解决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



工农兵在第二次全俄议会代表大会上参加国家行政工作。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是如何进行的？

资产阶级权利如何受到限制？这个限制的进程不可能比“四个全部”的改造进程更快。张春桥指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转向修正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放弃对

我们的侵略和颠覆，不仅因为中国的老地主和资本家还在，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而且因为新的资产阶级成分‘每日每时都在产生’，正如列宁所讲。

.....

我们常说所有权问题“基本解决了”；这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废除。上述统计表明，私有制在工业、农业和商业仍部分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而是包括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中还是比较薄弱。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领域中资产阶级法权的消失，意味着一切生产资料都转化为全社会的共有财产。显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我们都不能忽视摆在我们面前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领导权的任务。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涉及到领导权问题，即究竟是哪个阶级在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掌握所有权的问题。” [\[26\]](#)

这个论点是完全可取的。它为如何在非国有部门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启示——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将所有财产逐步转变为全民财产。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内部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仍然存在。毕竟，作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每天每时都在产生”，“大官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源头。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而不是非国家垄断资产阶级。

让我们从要采取的初步措施开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剥削性工资必须立即降低到“工人工资水平”。这是底线。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正在我们的苏维埃政府雇员中产生……” [27]

“在苏维埃工程师、苏维埃学校教师和享有特权的，即最熟练和条件最好的苏维埃工厂工人中，我们观察到资产阶级议会制所特有的所有负面特征都在不断复兴，我们只有通过不懈的、持续的、长期的和持久的斗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才能逐渐战胜这种邪恶。” [28]

此外，必须通过使这些工作人员参与生产性劳动来限制这种剥削因素。毛泽东指出：

“必须保持干部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工人，而不是骑在人民身上的霸主。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与劳动人民保持广泛的、持续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重大举措；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29]

这些措施——降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至普通劳动者水平，并让这些工作人员参与生产性劳动——将作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基本限制。但是，这些还不够。为了消灭国家（state）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消灭国家本身，使其逐步消亡。列宁指出：

“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需要的那种国家，其政府机构是警察部队、军队和官僚机构（官僚作风），脱离人民并与人民对立。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是完善了这个国家机器，只是将它从一个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的手中。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如果想维护当前革命的成果并继续前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就必须‘粉碎’——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并通过使警察部队、军队和官僚机构与全体武装的人民合并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沿着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明的道路，无

产阶级必须组织和武装所有贫穷的、被剥削的人口，以便他们自己（受压迫者）直接将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构成这些国家权力机关。”^[30]

他还指出：

“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要将苏维埃成员变成‘议会议员’，或者变成官僚。我们必须通过让苏维埃所有成员参与实际的行政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部门正逐渐与人民委员会合并。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体贫困人口参与到实际的行政工作中去，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步——越多样化越好——都应该仔细记录、研究、系统化，通过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并体现在法律上。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每一个劳动者在完成了八小时的生产性劳动‘任务’后，无偿履行国家（state）职责——这个过渡特别困难，但只有这个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31]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劳动人民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行政、警务和国防的职能，直至消除官僚、警察和常备军。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武装的无产阶级本身将构成国家。但要达到这一点，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比“四个全部”的改造更快。因此，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既能推动“四个全部”的改造，又能推动国家消亡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办法就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贡萨罗（Gonzalo）同志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毛主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先验的方面；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重大且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政治进程和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发展的里程碑，具体体现在革命委员会中……”^[3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有如此重要的贡献，是因为它是实现废除“四个全部”和资产阶级法权、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手段。正如中国共产党指出的那样：

“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动人心的伟大革命，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更广更深阶段。

.....

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仍企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俘获他们的头脑，企图卷土重来。无产阶级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它必须正面迎接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每一次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造教育、文艺和所有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33]

党还指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全党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驳学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同时要对那些潜入党、政府、军队和各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批判和否定，将其清除或转调其它职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指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委

托给这些人。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做过并且还在做这类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

那些潜入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识破了，另一些还没有。有些人仍受到我们的信任，作为继任者受到训练，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仍安坐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 [\[34\]](#)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消灭走资派不是文革的目的，只是方法。目的是“改造灵魂”，正如他指出的那样：

“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是主要任务，但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是铲除修正主义根源的问题。” [\[35\]](#)

毛泽东在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最及时的。” [\[36\]](#)

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经过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总结了以下经验：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

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37]

巩固时期和跃进时期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不断革命”的具体表现，其最终结果是“四个全部”的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瓦解，国家的消亡，以实现全体武装人民的自治、父权制的破灭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完全和彻底消除——总之，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唯一的共产主义法权支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81 年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即决审判。

四、资本主义复辟无法阻止， 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反复辟加以否定

由此可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取决于资产阶级法权是被限制还是扩大。共产主义道路对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资本主义道路则是扩大或在问题上“停滞不前”。只要资产阶级法权不再受到积极限制，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权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

“如果中国发生右倾反共政变，我的结论是他们不会得到安宁，而且很可能是昙花一现。这是因为所有代表 90%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都不会容忍。到那时，右派可能会用我的话来巩固一段时间的权力，然后左派肯定会用我的其他话，组织起来，打败右派。” ^[38]

那么，怎样才能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呢？

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通过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但重点是，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期间确实进行了，而资本主义还是复辟了，可见单有文化革命是不够的。贡萨罗同志指出：

“1976 年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明明是复辟与反复辟之争的一部分，相反，它向我们展示了先验的有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向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中的重要性。” ^[39]

不间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但是，文化革命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这个过程（复辟 ↔ 反复辟）仍在全世界每个国家进行着。如果走资派在社会主义国家上台，他们就会立即谋求对共产主义者发动法西斯政变，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关键是一旦资产阶级法权不再受到限制（左派）就要立即夺取政权。这是毛在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做的。毛指出：

“夺权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是新的创造……我们已经夺取了权力，但它可能被再次从我们手中夺走……但我们必须保持住权力。这主要取决于左派的力量。当左派虚弱时，权力可能被再次夺走。因此，左派必须强大。我支持权力斗争。” ^[40]

然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尚未能够对毛进行反革命政变，而是将他从所有政治权力位置撤职，只留下他担任共产党主席。他利用这个职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在1976年，当时江青和张春桥都还未被选入党和国家的负责职位，华国锋假借召开拟选举他们分别为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十届三中全会，来逮捕他们及其支持者。我引用过的毛泽东留给江青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预言了这种情况。因此，江青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毛写道：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革命是无止境的。

在过去十年的斗争中，我竭力使革命达到顶峰，

但我失败了。

而你可以。

如果失败了，

你会坠入无尽深渊。

你会粉身碎骨。” ^[41]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控制，江青将被迫发动一场人民战争以夺取政权，正如毛指示她做的那样。然而，她并没有履行这个指示。结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必须从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吸取教训，即：

1、资产阶级法权一旦不再受到积极限制，就意味着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

2、党内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积极进行社会-法西斯国家政变并复辟资本主义。

3、没有政治权力，无产阶级就不能以文化革命为手段夺回政权。必须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

因此我强调贡萨罗同志关于“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理论的重要性，这是他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贡萨罗指出：

“通过党的军事化，我们向社会的军事化迈出了一步，这是在战略层面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军事化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海洋，它保卫着对权力的掌握，一旦取得就保卫它。我们参考中国革命的经验，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经验，那里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一切都从枪杆子里出来：党、军队、国家、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我们就这样发展了战争共产主义。

……我们必须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武装群众，直到全面武装人民。当这个目标达到时，地球上将不再有任何剥削。” ^[42]

我们应该将普遍武装人民理解为一种必要。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必须经过一段群众的动员、政治化和组织化时期。因此，这项政策的实施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国家消亡息息相关。人民武装为国家消亡提供军事基础。而且，它为社会主义反复辟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提供军事基础。

党内资产阶级一旦夺权并准备发动社会-法西斯政变，左派就有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短暂窗口期。在中国是1976年10月以前，而在苏联是在1956年党的二十大之前。在这两种情况下，左派（在中国以江青为代表，在苏联以莫洛托夫为代表）在政变之后采取行动为时已晚。

党内资产阶级一旦掌权，也就控制了人民军队。因此，它可以并且会用它来复辟资本主义。这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民兵的重要性，民兵可以由人民军队动员，但只接受地方机关下级共产党员的命令，因为动员民兵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这短暂的窗口期，共产党领导人有可能号召全党左翼、人民军队的左派特别是民兵左派，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装斗争中来。不可避免地，只有党、武装部队和民兵中的部分会加入左派——但是，这样做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反复辟打下基础。

人民战争一旦因此重新发动，就可以通过长期的持久革命战争，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许多原本支持走资派的党和军队及国家机关的人员转到社会主义反复辟的一方。遵循这个战略、这条道路并且只有这条道路，才能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否则，资本主义将会完全复辟，该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将发现自己在在一个社会-法西斯国家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要工作更长时间。只有走这条路，上述毛泽东同志对修正主义国家的预言才能成真。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来自“敢”圈子的毛派造反者。

五、结论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列毛主义的最终贡献，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它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人民的普遍武装、反对“四个全部”的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延续的资本主义复辟与社会主义反复辟斗争等问题密切相关。对所有共产主义者以及所有想革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先验重要性的理论。

如果不把握这个理论及其各个方面，及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意义，就不可能进行不间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掌握这个理论之前，无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付出多少努力，流多少鲜血，资本主义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复辟。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该理论是绝对必要的。

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公开的法西斯国家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掌握这个理论，否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社会-法西斯国家工作的同志们也必须掌握这个理论，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自己必须走的出路。全世界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必须掌握这个理论，因为只有理解它才能将我们带向共产主义。有了这种理解，就会如贡萨罗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们注定要赢！

[1] 我主要依据去年在 bannedthought.net 上发布的三份文件。它们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关于党内资产阶级问题综述》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后两个文件仅有中文版本。秦正贤同志在 1976 年夏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撰写的第三份文件特别有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走资派十月政变后的几星期广播了这本小册子，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革命英雄主义，尽管修正主义者禁止印发小册子。

[2] 毛泽东：《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

[3] 同上。

[4]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 1 月至 10 月）

[5]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 4 月至 5 月）

[6]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 月至 9 月）

[7] 见卡尔·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2.03.05）

[8] 毛泽东——引自《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1974.02.22）

[9]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0 年 7 月至 1871 年 5 月）

[10] 毛泽东——引自《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1974.02.22）

[11] 见列宁：《论“左派”幼稚病》（1920 年 4 月至 5 月）

[1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1 年）

[13] 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1967.11.23）

[14]毛泽东——引自《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1974.02.22）

[15]毛泽东——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报》和《解放军报》编辑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1970.04.22）

[16]见 Deng-yuan Hsu 和程宝瑜：《Rethinking Socialism》（1997 年之前）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04.28）

[18]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1975）

[19]华国锋：《动员全党，大力发展农业，在全国建设大寨型县》（1975 年 10 月 15 日）

[20]同上。

[21]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的讲话》（1975.09.15）

[22]毛泽东——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定》（1955 年 10 月 11 日）

[23]毛泽东：《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

[24]毛泽东：《遗嘱》（1976 年 5 月至 6 月）

[25] 见毛泽东：《同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谈话》（1975.05.04）

[26]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1975）

[27]列宁：《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 年 3 月）

[28] 列宁：《论“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至5月）

[29] 毛泽东——引自《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历史教训》（1964年7月14日）

[30] 列宁：《远方来信》（1917年3月）

[31] 列宁：《苏维埃政府的迫切任务》（1918年3月至4月）

[32] 贡萨罗《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1988年1月）

[3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08.08）

[3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05.16）

[35]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05.01）

[36] 毛泽东——引自林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69年4月1日）

[37] 毛泽东：《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3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07.08）

[39] 贡萨罗：《论马列毛主义》（1988年1月）

[40] 毛泽东：《与周恩来谈权力斗争》（1967）

[41] 毛泽东：《遗嘱》（1976年5月至6月）

[42] 贡萨罗：《秘鲁共产党政治总路线的讨论基础》（1988年1月）

